

中国近代早期报刊的传播功能分析

高金萍

提 要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895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发展的早期阶段,也是中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这一历史阶段中中国的报刊,除了具有浓郁古代气息的官办“邸报”和民营“京报”以外,一是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创办的宗教性和商业性报刊;二是政府官员的译报及国人自办的民营报刊。本文从三个层面分析了它的功能:政治功能——环境监测、社会协调,经济功能——信息告知、活跃市场,社会文化功能——社会化,提出近代早期报刊承担着环境的“瞭望者”、信息的“传播者”角色。

关键词 近代早期报刊 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融合体 传播功能

众所周知,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这一历史阶段,正是梁启超在《50年来中国进化概要》中所指出的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第一个阶段,^①也就是本文所界定的中国近代早期。这一阶段,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转型期,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生活到国际关系,近代中国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曾经指出,当一个社会开始现代化时,发展的第一批迹象之一即是传播渠道的延伸。^②中国近代以前,主流传播媒介为官办的“邸报”和民间报房印刷的“京报”,严酷的思想钳制和文字狱制约着传播活动的开展。无论是官办的“邸报”,或是民营的“京报”,均属于古代传播,传播范围较小,传播对象基本确定,具有鲜明的组织传播特征。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势力强行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从形态到内容都焕然一新的近代早期传播媒介,传播渠道得以扩张,推动了国人现代化意识的启蒙和形成。

从创办主体的角度来说,中国近代早期的传播媒介可分为两类:一是外国传教士及商人创办的报刊;二是官方译报和国人自办的民营报刊。作为中国近代早期历史转型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催化剂,近代早期报刊没有脱离组织传播(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的框范,又不具备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的完全属性,就其传播的基本特征来看,属于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融合体。在中国

① 梁启超:《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50页。

② [美]威尔伯·施拉姆著,金燕宁等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近代早期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早期传播渠道之一:外国人创办的报刊

19 世纪 30 年代西方传教士率先打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将现代报刊和西方科技文明引入中国。1833 年 8 月 1 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又译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Ocean's Monthly Investigation,下文简称《东西洋考》),这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该刊属于宗教性报刊,但是刊载内容不仅有宗教教义,还包括时事政治、商业信息、科学文化知识,以及言论。《东西洋考》大量介绍东南亚各国和印度的情况,褒扬英国殖民统治,旨在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早在 1810 年,清嘉庆帝就发布谕旨:“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①此后,清政府也三令五申严禁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报刊,而此刊却在广州公开出版两年之久,报史学家白瑞华认为,其中原因在于郭士立本人“与中国人之间有不寻常的良好关系。”^②1835 年《东西洋考》临时停刊,1837 年在新加坡复刊,复刊后十分重视从商的读者,第二年开设“贸易”栏,力陈中西贸易的益处,甚至毫不避讳当时敏感的“鸦片问题”。至此,《东西洋考》的传播重心已经脱离了宣教的中心主题,而把内容扩大到欧美商人最关心的贸易问题与鸦片问题上。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1838 年 10 月最终停刊。《东西洋考》的创刊号印刷 600 份,以后每期印刷 300 份,从它属于宗教性报刊的性质来看,当为免费赠送;从其内容来看,读者主要为华人信徒和外国传教人员。

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起,已经显示出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刊物,实质上是借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企图以西方模式改变中国人的头脑,本质上属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传教士来华传布“福音”并为此编纂《华英字典》、出版宗教性报刊,究其传播目的,并非是将中国引向现代化,他们所期望的是“通过‘福音化’达到西方化,而西方化绝不等于现代化”。^③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 19 世纪末期,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数字已经接近 200 种,其中相当大部分是外国传教士主办的,同时还出现了外国商人创办的商业性或综合性报刊。1857 年 11 月 3 日由孖刺报馆出版的《香港船头货价纸》(1872 年 5 月 4 日更名为《香港中外新报》),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份外国商人创办的中文报纸。有学者指出,《香港船头货价纸》实为英文报纸《孖刺报》(The Daily Press)的中文版。^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

① 转引自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见《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卷 2,第 147 页。

②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4 页。

③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序言第 3 页。

④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5 页。

成为报业中心,90年代后出现了“申、新、沪”三家商业性报纸鼎足而立的局面,^①而其中影响最大、创办时间最长的是《申报》。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等四人合资创办。《申报》以赢利为首要目标,为此美查刻意追求报纸的“中国化”,不仅形式上采用中国的竖排版式,而且毫不犹豫地将编辑大权交给了蒋芷湘、钱昕伯等中国文人。在外国人所办报刊中,《申报》是第一家始终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1889年美查离开时,该报发行量已达到6000份。19世纪末,《申报》在上海滩影响之大,以致当时人把报纸泛称为“申报纸”。1909年9月席子佩以1500银元购进《申报》,从此该报成为国人所有的报纸。^②

客观上,外国人在华出版创办的报刊大量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及现状,介绍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宣扬了西方的富强之术,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后出版的一些中文报刊,如美国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英国商人创办的《申报》等,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打破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关于世界的认识,对长期处于思想禁锢状态中的中国读者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中国近代早期传播渠道之二:官方传播与国人自办的民营传播媒介

鸦片战争的失败,也震醒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已冻之脑袋”,他们睁开双眼看世界,推动了国人译报以及自办报刊的诞生。这些传播媒介既包括清政府官员为了统治阶级内部传递信息而编译的报刊,也有国人自办的民营报刊。从社会影响来看,由于清政府对传播权的控制,前者的影响力大于后者;从创办目的来看,二者都有着强烈的抗击外侮、强大中国的意图。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重视报刊的人。1838年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广东禁烟,他发现“沿海文武官员并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由此,他决定派人搜集当时澳门出版的主要外国报刊,进行编选翻译,以了解“夷情”。林则徐给奕山的信中说:“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较多。……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印出。系将广东事传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近雇有翻译之人,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取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③这些译报先是零散的,后来汇集成册,即《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澳门新闻纸》现存6册,第一篇为1838年7月16日稿,最后一篇为1840年11月16日稿;《澳门月报》见于魏源的《海国图志》。译报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军事和中外贸易等方面的时事报道,译报的来源有《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孟买新闻纸》等英文报刊。译报前后持续时间只有一年多,林则徐被罢黜后,译报工作仅延续一个月终告停止。魏源称林则徐

^① “申、新、沪”三足鼎立指的是19世纪90年代,上海滩的三家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激烈竞争的局面。这三家中文商业性日报是《申报》、《新闻报》(1893年创刊)和《沪报》(1882年创刊)。

^② 徐培汀:《中国传播思想史》(近代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③ 《答奕山将军防御粤省六条》:见《林则徐书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的这一做法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澳门新闻纸》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译报，它显示了官方有识之士对近代报刊的重视，是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先声。

1874年国人自办报刊出现，这一年，容闳筹集兴办的《汇报》在上海创刊；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刊；1884年广州的第一份国人自办报纸《述报》创刊。这些民营报刊的处境是十分尴尬的，内有清政府的压制，外有外国人在华报刊的排挤。《汇报》出版一年半，始终处于政府的限制之下，甚至要靠“打洋牌”来求得政治上的庇护，^①避免官府的责难。该报自创刊就公开宣言：“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中华之事而言之。”1875年7月16日干脆更名为《益报》，以示报纸对官府有益而无害。但是，仍然受到政府钳制，发行量不大。《述报》也仅仅出版一年左右。

《循环日报》以“华人出资、华人操权”为标榜，重视政论，每日刊登一篇论说，大肆宣传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而一切言论又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归依。王韬认为：“盖洋务之要，首在变法自强”，^②他对洋务派造兵舰、制枪炮的“洋务运动”，只学西方的坚船利炮，批评为“徒袭皮毛”。^③王韬主张变法自强，“今日之当变者有四：一曰取士，二曰练兵，三曰学校，四曰律例”。^④他认为君主立宪制与中国三代遗风相似，能上下相通，军民共治。王韬主持《循环日报》笔政达十年之久，这些思想也贯穿于《循环日报》的政论之中。该报除了在香港发行外，还覆盖广东沿海及内地通商口岸。王韬积极倡导商业化经营，这是该报得以长期出版的原因。

中国近代早期国人自办的民营报刊，大多采用股份制经营，刊登广告，有鲜明的国家民族意识，受众为官绅士大夫与少量商人，至今尚未见到这些报刊发行量的具体记载，它们是作为官方传播的补充而存在的。直到维新变法运动发生，康梁等人创办的维新报刊，才真正深入社会大众，覆盖沿海及内陆省份，成为中国人的重要喉舌与耳目。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必须通过变法求自强，他们的识见显然已经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层面，逐步转向对制度层面的关注，显然他们的传播活动为维新运动的发生酝酿着舆论基础。

转型时期中国近代早期报刊的特征

中国近代早期传播媒介出现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蕴涵着两种趋势，一是从独立国家转变为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势；二是从封建社会转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势。这两种趋势以现代化为中心，前者阻碍着现代化的进行，后者促动着现代化的开展。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近代早期报刊在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众和传播技术四个方面呈现出独

① 《汇报》实际主持报务的是广东人邝其照，特聘英国人葛理（Grey）担任名义上的总主笔。因在消息和评论中涉及政事，遭到官府非议，不得不于1874年9月1日更名为《彙报》，由葛理出面承顶并任发行人，以求得政治上的庇护。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洋务下》。

③ 徐培汀：《中国传播思想史》（近代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159页。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上》。

有的特征。

传播者方面,中国近代早期传播媒介的传播者与职业传播者、职业新闻人还相去甚远。从社会分类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传播者还处于由“传统士大夫”向“现代型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中。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并不能被垄断教化,他们来自各个阶级,虽然他们依然可能和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可以在以往‘学而优则仕’的正途之外获得生存,他们以知识、思想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作为职业。”^①前代的报人多因科举不第或不顺而被迫离开传统体制另谋生计,他们被视为“落魄文人”,其职业“不为世所重,高才之辈莫肯俯就”,在近代早期,报业并未成为社会中一种正式并且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职业。虽然前代报人们的身份也开始向现代型知识分子转变,但报纸在他们心目中实际上是实现原有“传统士大夫”理想的工具和途径,于是报纸成了王韬眼中“宣扬国威、义切勤王”的工具,又或是成为康梁们手中政治运动的言论工具。

传播内容方面,近代早期报刊传播的信息与古代传播相比,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其积极意义是,这些报刊都把西学知识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客观上对国人来说发挥了启蒙作用。其消极意义,正如阎小波先生所指出的,“西人喧宾夺主,国人长期丧失制造舆论的主动权”。^②转型时期的近代报刊在内容上还带着传统的烙印,译报以科技、军事、外交为主,缺少西方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经典,反映出“用”多“体”少的特征。少量倡言“变法”的报刊出版不畅,原因首先在于甲午战争前政治气候尚缺乏锐意改革之风气,少量先觉者难免因言获罪;其次在于甲午战争前报刊的发展还处于开阔国人眼界阶段,谋变法之音难免曲高和寡,应者寥寥。

受众方面,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待西学的态度是拒斥的,对待传教士、外国商人创办的报刊的态度也是抗拒的。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近代早期报刊的传播范围是极其狭小的,很多报刊的发行量徘徊于千份左右,受众仅限于少量特定人群,如宗教性报刊面对的是教民;商业性报刊面对少数的商人,无法深入到大众中去。以《申报》为例,19世纪末该报已成为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全国发行,1889年它的发行量仅为6000份,而当时上海的总人口为108.7万人,即使以每份报纸5人的传阅率计算,《申报》覆盖的人口也仅仅为3万人口。《申报》曾对19世纪各界对报刊的态度进行过分析:官场对报纸的意见恐有发其履,深恶而痛忌之;学界平时视报纸供消遣,作谈资而已,专留心考试时的试题及榜案;工商界对报纸的论说视若无睹,稍能读报者,不过喜看盗案、奸淫案之类新闻;农民则不知有所谓报纸。^③

传播技术方面,早期《东西洋考》使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客观上是因为西洋印刷术尚未传入中国,主观上是为了追求报纸的“中国化”。19世纪60年代后,西洋印刷术的三种形式(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凹版印刷)陆续传入中国。^④在西洋技术的刺激下,中国印刷业得到了快速发展。1861年字林洋行出版的《上海新报》,采用瑞典纸双面印刷;1872年《申报》采用手摇轮转印刷机;1876年上海已有四

① 张洁:《新闻职业化的萌芽》,见《新闻大学》,2006年第3期。

② 阎小波:《论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见《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③ 《申报》,1906年2月5日。

④ 王建辉:《中国出版的现代化》,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家出版机构采用了活字印刷。这些技术上的革新,对中国报刊走向现代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近代早期报刊的功能分析

探究近代早期报刊的传播特征,旨在为近代早期报刊在社会传播系统中定位。人类传播是一个综合系统,这个系统是由不同类型的传播活动组成的,每种类型的传播同时也是社会传播这个总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近代早期报刊的两个传播主体——外国传教士及商人、政府官员及国人,宏观上属于两个不同的组织体系,前者属于殖民组织,后者属于被殖民者的组织。二者分属的组织体系,决定了它们所从事的传播活动有着迥异的利益趋向,在传播内容上也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追求,前者是以宣教为手段的文化殖民,后者是以广见闻、开民智为手段的社会变革。从近代报刊传播主体的组织归属色彩鲜明这一点来看,它具有组织传播的色彩。组织传播是指某个组织凭借组织系统的力量所进行的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组织就是有序化的人群体,人类社会就是各种各样组织的综合架构。组织是同信息传播同步生成的,组织的目标、系统、规范的形成和运作都离不开传播。多数组织的传播活动是手段,通过传播来实现组织自身的任务。

分析近代早期报刊的传播对象、传播内容和传播目标方面的特点,不难发现:其一,它的传播对象不是特定的,它是面向全社会发行的,即使传教士的宗教性报刊,也带着西方现代报刊的明显特征,有着面向社会全体大众的强烈意识,旨在吸引更多的社会大众;其二,受众接受传播内容是自愿、自主的,而不是被强制的;其三,它的传播是受众本位的,无论是外人还是国人在华办报,都以扩大发行量、扩大社会影响为目标。从上述方面来看,近代早期报刊又具有大众传播的特征。

由上可以得知,中国近代早期报刊是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融合体,而且体现出浓郁的组织传播色彩。在社会信息系统中,中国近代早期报刊归属的传播类型,决定着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回归中国近代早期的媒介环境,作为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融合体的近代早期报刊,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及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传播功能分析也可以从这三个层面入手。

政治功能——环境监测、社会协调。近代早期进入中国的许多传教士具有多重身份:传教士、外交官、商人,《东西洋考》的创办者、出生于普鲁士的传教士郭士立后来正是《南京条约》的中文译稿人,他肩负的使命不仅是传教,而且为殖民服务搜集信息,这在他主办的报刊中有所表现。他在《东西洋考》的出版计划书中明确表示:“此刊物将不谈论政治,也不要任何问题上以刺耳的语言触怒他们。我们有更高明的办法显示我们并非‘蛮夷’。编者认为更佳之手法是通过事实的展示,从而说服中国人,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①解析郭士立的创办目的,就是改变中国人对西洋人的偏见,维护欧美旅华人士的共同利益;具体方法是介绍西方的文化、艺术、科学知识,证明西方人并非中国人想象中的“蛮夷”。外国人创办的大量宗教性报刊,客观上发挥了监测中国舆情,协调中西关系的功能,《东西洋考》是为代表。而林则徐等开创的译报,本身宗旨在于

^①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4 页。

收集情报作为清政府决策的资鉴,他利用报刊来满足获取情报的需求,并不懂得运用报刊传播信息和舆论的功能来推动民族自强的事业。但是他的译报为清政府了解国际形势和国际惯例、制定对外方略,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知识。

经济功能——信息告知、活跃市场。近代早期外国商人创办的商业性报刊出现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既有英文报刊,也有中文报刊,在传播内容上,它们以刊登广告、商品行情、船期等商业性信息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本国政府的观点,1850年创刊的英文《北华捷报》,商业性周刊,1859年后被英国驻沪领事馆指定为公署文告发布机关,人称“英国官报”(Official British Organ),它的信息及时,内容丰富,对中英贸易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社会文化功能——社会化。所谓社会化,“指的是一个人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①。从个人角度来说,它指的是个人学习语言、知识、技能、行为准则等以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从社会角度来说,它指的是社会成员形成大体一致的观念、价值和社会规范体系,从而使社会秩序维持、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得到保障的过程。近代早期的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观念与西方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碰撞和交流,而这种碰撞在文化层面上鲜明地体现在报刊中,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介绍了西方的文明和文化,向中国人传递了西方社会的行为规范,这些西学知识和西方文明推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走向现代化。国人自办的报刊将西方的新闻自由和政治改良思想介绍给大众,为维新运动进行了初期的舆论准备,为中国人的思想启蒙打开了大门。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的,通过西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接受近代知识是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首要实质性步骤”^②。

媒介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有着一整套的规范和行为模式,它的社会角色需要符合人们对它的期望,获得社会认知和理解,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充实其社会期望内容,这样才能形成其特殊的角色地位。中国近代早期的报刊,以大众传播之形负载着组织传播之实,在中国现代化趋势乍隐乍现的媒介环境中承担着环境的“瞭望者”、信息的“传播者”的社会角色,由于规模不大,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化功能的发挥也受到影响,然而这些都无法掩盖它们闪耀着的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光芒,是它们为大众证明了中国封建制度封闭、保守的危害,启迪大众将目光投向西方科技与文明。

(作者通讯地址:高金萍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100083)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②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2页。